

公共服务支出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吗？

——基于公共服务获得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李琦 倪志良¹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天津 300110)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收入差距大而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高的反差现象, 从公共服务支出的视角切入,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和宏观层面的匹配数据, 使用 Binary Probit 方法, 分析公共服务支出在这种反差现象中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公共服务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 而各项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不尽相同, 基础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显著提高了收入差距容忍度, 而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无显著影响, 并对此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该结论仍成立; 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因地区差异而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 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 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 提升了收入差距容忍度。

【关键词】: 公共服务支出 收入差距容忍度 IV-probit

【中图分类号】: F8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912(2021)08—0031—12

一、问题的提出

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事关个体福祉与社会稳定, 是个体基于“实然”环境条件与“应然”主观感受对自身、他人与社会所进行的评价(魏钦恭等, 2014)^[1]。于个人而言, 容忍度是个体根据自身禀赋、外在努力以及社会结构多维度综合反馈所形成的效应。于整个社会而言, 收入差距容忍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民生福祉与社会的稳定。收入差距容忍度将微观个体行为嵌入宏观层面维度, 与居民福祉和社会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

“十三五”期间, 中国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从 2016 年的 30.1%降至 2019 年的 28.2%¹, 体现出居民消费从“维持生活”向“享受生活”的升级。然而, 中国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 自 2003 年以来, 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在 0.46 以上,

¹**作者简介:** 李琦(1994-), 女, 内蒙古集宁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财税理论与政策、居民幸福与公共治理

倪志良(1966-), 男, 内蒙古赤峰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政府预算、税收与公共支出管理、居民幸福与财税责任。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项目“演化博弈视角下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选择及其福利效应研究”(19DJJJ10), 项目负责人: 殷金朋;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山东省高等教育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测度及优化空间研究”(2020YB043), 项目负责人: 殷金朋

2008 年达到峰值 0.491, 2019 年为 0.465², 尽管收入差距缩小, 但仍然位于国际认定标准“差距较大”³的区间。相关研究也表明公共政策虽然对于中国收入差距的缓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依然任重道远(李实和罗楚亮, 2012)^[2]。经济发展的这种“双重特征”自然引发研究者对不公平与社会稳定的讨论。然而, 多数研究发现对于较高的收入差距, 中国居民容忍度却很高(怀默霆, 2009; 刘欣和胡安宁, 2016; 魏钦恭, 2020)^{[3][4][5]}, 并没有出现一触即发的“火山”现象。收入差距容忍度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稳定, 但并不代表市场资源配置高效, 由于信息不充分及个体的有限理性, 主观收入差距与实际差距可能并不一致, 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 减少客观收入差距仍为必然趋势, 同时通过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以降低主观收入差距也具有其必要性。

个体存在于外部环境中, 都会受到外在环境程度不一的影响。社会情境会影响个体关于收入分配的主观感受和态度观念(魏钦恭, 2020)^[5], 公共服务显然成为个体与社会情景联系的枢纽。基本公共服务是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体现(胡洪曙和武锶芪, 2019)^[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此,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资源配置以弥补市场失灵, 提供多元公共服务以满足居民多维所需, 个体因获得公共服务而产生不尽一致的满足感和效用, 公共服务这一社会情景作用于个体的主观感受, 继而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发生变化。

鉴于此, 本文聚焦公共服务支出, 在考虑收入分配问题时将公共服务纳入微观框架, 考察微观层面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探索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及其内在逻辑, 以期有效配置公共与个体收入资源、重视公共服务与私人资源的互补作用以及收入分配与民生福利的改进提供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1) 将研究视角推进到公共服务支出落实于微观主体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分析中, 探析其中存在的影响机理; (2) 多维度考察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情况, 基于各类公共服务支出, 考察公共服务对容忍度的综合影响与分类影响; (3) 考察了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 (4) 有助于理解过大收入差距与较高容忍度共存的反差现象, 立足居民内心感受, 充分考虑个体主观体验以优化公共服务, 提质民生水平。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收入差距容忍度受客观收入差距与感知收入差距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感知的收入差距对居民容忍度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魏钦恭, 2020)^[5]。居民感知收入差距越大, 对不平等的厌恶倾向越明显, 而居民感知收入差距具有感知偏差, 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下具有差异(Hirschman & Rothschild, 1973)^[7]。因为存在“情景效应”, 可以理解收入差距越大, 居民容忍度越高这一现象。由于宏观主导价值及社会共识的存在, 社会群体感知的收入分配受到影响(Shepelak & Alwin, 1986)^[8]。基于社会分配的社会观念已经由改革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转变为“患不均, 更患不公”(李路路等, 2012)^[9]。公共政策在社会公平价值导向框架下成为市场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公共支出促进了起点公平, 同时也对结果公平创造了必要条件(吕炜, 2004)^[10]。近年来, 社会公平的实现已然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 而社会公平的重要特征是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李秀玫等, 2018)^[11]。在“服务型政府”背景下, 民生类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呈上升趋势,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占比逐步提高(赵建国和于晓宇, 2020)^[12]。个体从外部环境获得公共服务而产生的效用和满足感, 作用于其当前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剥夺感”, 个体所感受到的收入差距并不等同于客观收入差距标准, 前者更能反映居民内在认知与感受, 与外在环境联系相适应, 个体基于外部公共服务的获得感而产生情景反应, 对收入差距的认知回路与情绪回路发生改变, 进而对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差距容忍度选择发生改变。鉴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公共服务支出越高, 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越高。

个体基于所获得的公共资源产生对于公共服务的认知与评价, 而主观评价影响获得感及主观福祉水平, 由此公共服务及获得感具有相关性(廖福崇, 2020)^[13], 但是由于各级政府间的“晋升锦标赛”, 使得公共服务的体验感难以优化(黄晓春和周黎安,

2019)^[14]。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但分权后公共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并没有随之提高,社会不公进而产生(郁建兴和高翔,2012)^[15]。居民收入不公平感会随着偏离参照群体收入的幅度而增大(马磊和刘欣,2010)^[16],进而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就更低。若个体与参照群体所获得公共服务差异较小,由此获得的满足感与收入比较的失衡相融合,决定个体对公平与收入差距容忍度的认知。基于此角度,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容忍度的影响中存在不可或缺的作用。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公共服务支出提升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且公共服务获得感提高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即居民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

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因收入分配而产生的“不公平感”具有缓解作用(陈刚和李树,2012)^[17],个体的社会公平感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李秀玫等,2018)^[11]。但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呈现出东、中、西部递减趋势(王敬尧和宋哲,2008)^[18]。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受限于有限的不平衡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王洪川,2021)^[19],影响公平感与容忍度。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因公共服务的差异具有异质性。此外,有研究表明,对于不平等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具有更多的批判思维(李骏和吴晓刚,2012)^[20]。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怀默霆,2009)^[3]。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促使预期收入水平的提高,当预期难以实现,就会对现时的既得收入分配产生出更多的不公感(李颖晖,2015)^[21]。因此,个体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差距容忍度也具有差异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3: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因公共服务的差异性而存在地区异质性及个体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用微观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组织实施方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调查内容涉及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包括个人及家庭成员的人口基本信息、公共服务信息、个体公平感等主观评价信息,具有研究的代表性。由于该调查为非追踪数据,结合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收入差距容忍度”,选择 2015 年的截面数据。此次调查分为 A 卷和 B 卷,鉴于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只在 B 卷出现,且对所需变量进行筛选,剔除缺少关键变量以及不符合逻辑的样本,最终获得 9399 个观测值。4 省级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已有研究多数将收入差距容忍度与公平感相联系(Ng & Allen,2005)^[22],即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感知越高,越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容忍度越低。也有研究指出在一定区间内,容忍度从容忍到不能容忍应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魏钦恭,2020)^[5]。考虑到收入差距容忍度是基于客观事实而形成的主观变量,并结合已有研究,本文使用 CGSS2015 数据中与此相关的问题“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的少,但这是公平的”作为收入差距容忍度的代理变量,该答案分别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由此看出,收入差距容忍度为离散变量,本文将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样本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此外,根据语义理解,可以认为,受访者越认同公平,则收入差距容忍度越高,容易看出这是一个序次型变量,为了考察结论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并易于理解,将样本转置并赋值“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所谓”、“同意”、“非常同意”分别为 1、2、3、4、5。进一步,本文用“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来衡量收入差距容忍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另一个代理变量,同样将样本转置并赋值“非常不合理”、“不合理”、“合理”、“非常合理”分别为 1、2、3、4。将回答“合理”及“非常合理”的样本赋值为 1,其他回答赋值为 0。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公共服务支出，衡量指标包括总支出及分项支出，其中分项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总支出为各分项之和。分别从整体投入及分项投入的角度探究公共服务提升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内在机理。对分项金额以及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总数分别取对数，以避免量纲差距及异方差性的影响。

3. 控制变量与机制变量

参照现有文献，本文控制了：(1)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户口类型等个体维度上的变量。另外，收入差距容忍度可能受到个体主观评价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个体主观健康水平、社会公平感、幸福感和社会地位变量进行控制。(2)省级层面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此外，基于地区差异的考量，本文控制了地区变量。(3)机制变量。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对各项公共服务评价的综合衡量指标，个体由于获得各项公共服务及由此产生的效用可能对个体的收入差距容忍度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认为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中存在中介调节机制。由于个体是基于客观现实与主观认知来判断收入差距，当个体自身实际收入与理想收入具有差异，外在获得感可能对此具有互补作用，因此主观公共服务获得感在某种程度上与收入差距容忍度存在更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在 CGSS2015 数据中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您对政府所提供的下面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如何 0 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00 分代表完全满意，您分别给打多少分？”基于此，本文将居民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主观评价以及将各类公共服务评价的平均值分别作为各类公共服务获得感以及公共服务总体获得感的代理变量，由于 CGSS2015 中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是分别评价的，而宏观数据对于就业和社会保障是一个整体数据，故本文将 CGSS2015 中这二者的评价得分取均值。

4. 样本描述性统计

如表 1 所示，次序型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均值为 3.484，二分类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均值为 0.763，可以看出，无论将收入差距按次序型还是二分类变量处理，收入差距容忍度都更接近于样本中的最大值，说明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较高。公共服务总支出、基础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和就业社会保障支出对数的均值分别为 7.673、6.761、6.033、5.185 和 6.487，均更接近于样本的最大值，说明公共服务总支出和各类分项支出较高。

表 1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ole	收入差距容忍度(次序型)	9399	3.484	1.036	1	5
toler	收入差距容忍度(二分类)	9399	0.763	0.425	0	1
Intexp	公共服务总支出对数	9399	7.673	0.396	6.076	8.385
lneduexp	基础教育支出对数	9399	6.761	0.467	4.959	7.621
lnmedexp	医疗卫生支出对数	9399	6.033	0.446	4.306	6.823
lnhomexp	住房保障支出对数	9399	5.185	0.455	3.846	5.879
lnsecexp	就业社会保障支出对数	9399	6.487	0.382	4.985	7.014
gend	性别	9399	0.477	0.499	0	1

education	受教育水平	9399	4.958	3.140	1	13
age	年龄	9398	51.003	16.710	18.250	95.167
marr	是否有配偶	9399	0.780	0.414	0	1
typ	户口类型	9399	0.593	0.491	0	1
health	主观健康水平	9399	3.627	1.067	1	5
fair	主观公平感	9399	3.202	0.998	1	5
happiness	主观幸福感	9399	3.874	0.811	1	5
status	主观社会地位	9399	4.348	1.631	1	10
unemrate	城镇失业率	9399	3.306	0.691	1.400	4.500
CPI	消费价格指数	9399	101.482	0.357	100.600	102.600
lngdp	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9399	10.100	0.628	7.790	11.196
edugain	基础教育获得感	9399	73.258	17.012	0	100
medicgain	医疗卫生获得感	9399	69.978	17.693	0	100
homegain	住房保障获得感	9399	66.930	19.552	0	100
jobsecgain	就业社保获得感	9399	68.103	17.031	0	100
averallgain	公共服务总体获得感	9399	69.274	15.360	0	100

(三)实证方法与模型设定

1.Binary probit 和 IV-probit 回归

由于被解释变量收入差距容忍度为离散型变量，本文选择 Binary probit 模型以测度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一致性，采用替代变量及更换回归模型的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利用 IV-probit 模型进行检验。基准模型为：

$$Tolerance_{ji} = \alpha_0 + \alpha_1 FE_{ji} + \sum \beta_j X_{ji} + \varepsilon_{1ji} \quad (1)$$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Tolerance_{ji}$ 为第 j 个地区第 i 个个体的收入差距容忍度。 FE_{ji} 为各省份公共服务财政投入。 X_{ji} 表示个体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 α_1 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防止变量遗漏产生估计偏误，本文尽可能将相关变量纳入估计模型。 ε_{1ji} 为误差项。

2. 机制检验

个人的主观感受会受到外部环境与内在认知的综合影响，个体收入差距容忍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自身所得到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存在更为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因此，本文认为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调节机制。本文参照中介效应模型(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23]，构建如下方程：

$$Tolerance_{\mu} = \gamma_0 + \gamma_1 FE_{\mu} + \sum \gamma_j X_{\mu} + \varepsilon_{2\mu} \quad (2)$$

$$Gain_{\mu} = \delta_0 + \delta_1 FE_{\mu} + \sum \delta_j X_{\mu} + \varepsilon_{3\mu} \quad (3)$$

$$Tolerance_{\mu} = \lambda_0 + \lambda_1 Gain_{\mu} + \lambda_2 FE_{\mu} + \sum \lambda_j X_{\mu} + \varepsilon_{4\mu} \quad (4)$$

其中，Gain_{ji}为第j个地区第i个个体公共服务支出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的中介变量，公共服务获得感。其他各项与基准模型设置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核心目标在于考察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首先将公共服务支出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因被解释变量收入差距容忍度为序数离散变量，根据评价得分设置二值变量，进行Probit估计，然后通过替代变量、更换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分析了异质性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内生性，最后考察影响机制。

(一)基准回归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当收入差距容忍度取值0或1时，使用Probit回归模型，得到表2的回归结果。模型(1)为单变量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此外，为获得稳健性结论，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可能影响容忍度的相关变量。模型(2)为引入个体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education)越高，个体收入差距容忍度越低，这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于公平的认知度较高，不公平感较强，收入差距容忍度低。有配偶(marr)负向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可能是由于有配偶的家庭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主观感受，增加了不公平认知，容忍度低。户口类型(typ)为城市的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低，可能是由于城市居民虽然可获得的发展机会多于农村地区，但同时面临更多的失业、环境、公共服务差异、收入的比较落差等，乐观预期与农村居民相较而言有所降低(怀默霆，2009)。城市收入差距可能较大，比较过多，攀比效应较强，且外部环境差距也较大，导致不公平感增强，降低收入差距容忍度。模型(3)控制了个体主观评价因素，发现个体主观身体健康水平(health)越高，收入差距容忍度越高，可能的解释为健康水平越高，提高了个体起点公平的概率，个体可行能力越大，越可能实现个体一切努力的至高目标，则个体主观满足感越强，对外在环境评价越高，继而收入差距容忍度高。个体主观公平感(fair)正向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可能的解释在于，个体的任一行为在起点、过程、结果上越趋于公平，个体对整个行为以及社会评价越高，有助于弥补自身收入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个体主观幸福感(happiness)越高，收入差距容忍度越高，个体主观幸福感是外在行为与内在追求相统一的综合评价，是一个具有多维度的指标，个体主观幸福感越强，对各方面的评价越高，容忍度显然较强。个体主观社会地位(status)正向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可能由于个体社会地位越高，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实现自身目标的满足感，收入差距容忍度高。模型(4)控制了省份层面的因素，发现城镇登记失业率(unemrate)正向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可能的解释在于：失业率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可能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较多，公共服务的获得提高了个体收入差距容忍度。地区生产总值(lngdp)越高，个体收入差距容忍度越低，可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较少，从而居民所获得的公共服务减少，外在环境没有有效弥补自身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的不平衡性，收入差距容忍度降低。为了直观的得到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具体数值，本文进一步计算了前者对后者的平均边际效应和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其中平均边际效应结果为0.0989，即当公共服务支出增加1个单位时，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提高的概率增加9.89%；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为0.1020，

即当公共服务支出的均值增加 1 个单位时，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提高的概率增加 10.20%，且两种结果在 1%水平上均显著。

表 2 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 Probit 估计

变量	(1)	(2)	(3)	(4)
Intexp	0.079** (0.036)	0.081** (0.036)	0.065* (0.037)	0.341*** (0.085)
gend		0.006 (0.029)	0.001 (0.030)	-0.001 (0.030)
education		-0.016*** (0.006)	-0.029*** (0.006)	-0.027*** (0.006)
age		-0.001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marr		-0.144*** (0.035)	-0.150*** (0.037)	-0.148*** (0.037)
typ		-0.182*** (0.032)	-0.131*** (0.033)	-0.112*** (0.034)
health			0.0347** (0.016)	0.037** (0.016)
fair			0.292*** (0.015)	0.288*** (0.015)
happiness			0.056*** (0.019)	0.062*** (0.020)
status			0.017* (0.010)	0.017* (0.010)
unemrate				0.045** (0.022)
CPI				0.049 (0.043)
lngdp				-0.179*** (0.053)
常数项	0.111 (0.274)	0.440 (0.283)	-0.582* (0.298)	-6.041 (4.472)
样本量	9399	9398	9398	9398

为进一步探究各类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本文分别对基础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和就业社保支出作 Probit 回归，分析各类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由表 3 回归结果可知，基础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正向显著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而就业社保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无显著作用。

表 3 不同类别公共服务投入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基础教育支出	0.410*** (0.083)			
医疗卫生支出		0.324*** (0.064)		
住房保障支出			0.232*** (0.038)	

就业和社保支出				-0.081 (0.060)
个体人口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主观评价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层面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250 (4.327)	-5.086 (4.376)	-6.654 (4.398)	0.401 (4.524)
样本量	9398	9398	9398	9398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更换回归方法及替换变量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回归方法方面，将被解释变量收入差距容忍度看作次序型变量，采用 Ordered probit 方法回归分析；基于二值选择模型，使用 logit 方法替换 probit 回归分析，并基于次序型变量，使用 Ordered logit 方法替换 Ordered probit 回归分析。在变量层面，本文更换了可互补的被解释变量。

1. 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处理为次序型变量，使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检验，此外使用 logit 模型和 Ordered logit 模型互补 probit 模型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表 4 中，模型 (1)、(2)、(3) 分别为 Ordered probit、logit 和 Ordered logit 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结论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检验均证实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即公共服务支出增加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

表 4 更换回归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Intexp	0.282*** (0.065)	0.579*** (0.146)	0.448*** (0.114)
个体人口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主观评价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层面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398	9398	9398

2.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收入差距容忍度高的个体会基于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认为当前所获收入是合理的，因此本文基于 CGSS2015 数据中与之相关的问题“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另一个互补变量，来衡量收入差距容忍度，将样本转置并处理为二分类变量进行 probit 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到，公共服务支出对该代表收入差距容忍度指标变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稳健。

表 5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ntexp	0.174*** (0.035)	0.174*** (0.035)	0.127*** (0.037)	0.237*** (0.084)
个体人口特征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主观评价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层面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482	8481	8481	8481

(三) 异质性分析

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是受客观收入差距与主观评价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个体差异及地区差异等因素，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效应可能不尽相同。本文控制了地区差异因素、户口类型以及由于个体受教育水平、个体主观健康水平差异所产生的个体异质性进行分析。

本文所划分的东、中、西部地区是按照中国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界定的⁵。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也具有差异性，因此有必要考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地区异质性。个体健康水平不同可获得的收入以及公共服务存在差异，因此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收入差距容忍度效应可能存在个体健康水平的异质性。此外，个体受教育水平不同，认知程度存在差异，继而对公平和公共服务的感受也存在差异，进而引起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个体异质性。

表 6 中，模型 (1) 引入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西部地区的交互项，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增强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正向影响，模型 (2) 引入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中部地区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不具有显著作用，模型 (3) 引入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东部地区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降低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正向效应难以弥补收入差距带来的负向效应，降低了收入差距容忍度，而西部、中部地区则具有相反的效应，进而提高了收入差距容忍度。模型 (4) 引入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农村样本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农村样本增强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正向影响，而模型 (5) 为引入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城市样本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城市样本降低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为：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可以提升居民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和满足感，进而提高了收入差距容忍度，而城市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基准较高，居民可能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更高的要求，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减弱，导致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降低。模型 (6) 纳入了个体受教育水平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模型 (7) 纳入了个体主观健康水平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个体主观健康水平的提高在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中无显著作用。基于上述结果，说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群体异质性与个体异质性，在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作用中存在交互影响。

表 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Intexp	0.247** (0.096)	0.174*** (0.035)	0.127*** (0.037)	0.337*** (0.085)	0.351*** (0.085)	0.347*** (0.103)	0.297** (0.147)
perw	0.013** (0.006)						

续表 6

变量	(1)	(2)	(3)	(4)	(5)	(6)	(7)
perm		0.005 (0.004)					
perea			-0.031*** (0.007)				
Ty1pe				0.014*** (0.004)			
ty2pe					-0.014*** (0.004)		
pexpedu						-0.001 (0.011)	
pexphea							0.013 (0.034)
个体人口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主观评价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层面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722 (4.519)	-7.389 (4.598)	-10.62** (4.569)	-6.033 (4.473)	-6.033 (4.473)	-6.063 (4.478)	-5.733 (4.550)
样本量	9398	9398	9398	9398	9398	9398	9398

(四)内生性分析

根据被解释变量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分布特征,采用 Probit 作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在估计过程中因遗漏变量、估计偏误、互为因果等因素,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产生。由于居民对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与评价可能受到一些难以观测和衡量因素的影响,从而对公共服务的满意评价存在偏差,影响结论的有效性。此外,由于研究数据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且在选取及测度所研究指

标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存在一定的测量偏差。在双向因果分析方面，公共服务支出可能影响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这是本文关心的因果关系。然而，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高低也可能影响公共服务支出。收入差距容忍度高的个体可能需要外部更多的公共服务以平衡自身容忍差距的不公平性。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收入差距容忍度高的个体，已将不公平感内在化，无需投入更多的公共服务。无论是上述何种情形，会导致基本回归结果的估计系数存在偏误且不一致，无法正确推断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为此，本文参考李娜和袁志刚(2015)^[24]的研究，将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纳入进来，将其作为公共服务支出的工具变量，使用 IV-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模型(1)为基准 Probit 回归，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为被解释变量。模型(2)和模型(3)为 IV-probit 估计，其中模型(2)为 IV-probit 回归的第一阶段结果，公共服务支出为被解释变量，可以看到地方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rateexp)在 1%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公共服务支出，而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rateinc)在 1%显著水平下，对公共服务支出具有负向作用，二者均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说明对内生性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模型(3)是 IV-probit 回归的第二阶段结果，收入差距容忍度为被解释变量，基于原假设为解释变量外生性的 Wald 检验，在 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由模型(1)回归结果的系数 0.341 与模型(3)估计结果的系数 0.446 对比可以发现，可能由于模型(1)忽略了内生性问题，从而低估了公共服务支出提高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概率。进一步地，本文对工具变量过度识别进行了检验，所得 P 值为 0.8400，接受原假设不存在 IV 过度识别问题，模型设定合理，验证了工具变量外生的假设。

表 7 IV-probit 估计的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3)
Intexp	0.341*** (0.085)		0.446*** (0.101)
rateexp		0.343*** (0.002)	
rateinc		-0.243*** (0.002)	
Wald 检验			3.96
个体人口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主观评价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层面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041 (4.472)	3.387*** (0.349)	-7.379 (4.514)
样本量	9398	9398	9398

(五)中介效应分析

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中介机制分析，可以深入理解公共政策作用于微观主体容忍度的内在作用机制及影响路径，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以验证公共服务获得感的中介调节效应。公共服务获得感是一个多维度的基于客观环境结合主观感受的综合指标，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以及认知回路，个体因收入差距产生的“攀比效应”和“隧道效应”会因外部公共服务环境呈现差异性，进而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这一选择。公共服务支出有助于提升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而后者对收入差距容忍度存在更为直接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中介调节作用，以全面

了解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机制。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从模型(1)可以看出公共服务支出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概率，模型(2)显示公共服务支出提升了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模型(3)同时纳入了公共服务支出和公共服务获得感指标后，二者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正向效应仍显著，验证了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正向中介调节作用。上述事实基本证实，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过程中发挥着中介调节机制的作用。

表 8 公共服务获得感的中介调节效应

变量	(1)	(2)	(3)
Intexp	0.341*** (0.085)	3.477*** (0.859)	0.307*** (0.086)
avegain			0.009*** (0.001)
个体人口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主观评价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层面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041 (4.472)	158.3*** (46.51)	-7.491* (4.489)
样本量	9398	9398	9398

本文对此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由于被解释变量收入差距容忍度是分类变量，中介变量公共服务获得感为连续变量，使用广义结构方程(gsem)方法检验中介效应，进而计算出总效应和中介效应。

表 9 汇报了 gsem 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公共财政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将二者共同引入模型，结果显示二者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均存在正向影响，验证了上述结论。本文进一步计算了总效应为 0.025, 总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为 0.008, 虽然系数不大，但是 P 值显著，即中介效应成立，则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 32%。

表 9 gsem 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结果

变量	avegain	toler
Intexp	1.658*** (0.400)	0.017 (0.011)
avegain		0.005*** (0.000)
常数项	56.550*** (3.070)	0.316*** (0.085)
样本量	9399	9399

五、结论与启示

尽管各项政策缓和收入差距的拉大，但中国的收入差距仍然较高，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却很高。一方面，居民可能根据自身能力的判断或由于“隧道效应”对未来持有乐观期望，另一方面，居民可能受影响于社会共识的制度性评价(魏钦恭, 2020)^[5]。任何社会个体都是嵌入制度环境的，这些制度环境对人们的行动和偏好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刘欣和胡安宁, 2016)^[4]。政府财政支出是调和不公平的重要途径，不公平是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首要感受，同时公共服务支出与民生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探索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容忍度的内在机理。

本文基于中国收入差距大而容忍度高的反差事实，从公共服务支出视角切入，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和省级层面的匹配数据，使用 Probit 方法，探究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概率，且使用 Ordered probit 以及 Logit 等方法变换回归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并且利用 IV-probit 检验了该结论的内生性问题。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因地区差异和户口类型的差异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显示，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公共服务支出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作用，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

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1) 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例，加大公共财政支出时注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尤其是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和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有效提高居民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和效用。(2) 兼顾居民对公共服务获得感提升的综合性评价。居民基于所获得的公共资源，依据其产生的效用及满足感进行主观评价，而财政投入直接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进而提升了民生获得感，居民因外部环境和制度提升的满足感互补了个人收入差距的不公平感，由此产生较高的收入差距容忍度。从这一角度，政府在加大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要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提升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以平衡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推进社会公平建设。(3) 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总量的同时要注重公共服务供给差异。由于地区差异及个体差异，居民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因此存在差异性，鉴于此，政府的财政投入在加大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总量的同时注重居民因外部因素及自身内部因素所产生的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导向，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层面匹配的一致性，及时回应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 [1] 魏钦恭, 张彦, 李汉林. 发展进程中的“双重印象”: 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公平感研究[J]. 社会发展研究, 2014(03): 1-32, 240.
- [2] 李实, 罗楚亮.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变动与长期趋势[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04): 186-194.
- [3] 怀默霆.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J]. 社会学研究, 2009, 24(01): 96-120, 244.
- [4] 刘欣, 胡安宁.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 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J]. 社会, 2016, 36(04): 133-156.
- [5] 魏钦恭. 收入差距、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J]. 社会, 2020, 40(02): 204-240.
- [6] 胡洪曙; 武锑芪. 基于获得感提升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优化研究[J]. 财贸经济, 2019, 40(12): 35-49.
- [7] Albert O. Hirschman and Michael Rothschild.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87(04): 544-566.
- [8] Norma J. Shepelak and Duane F. Alwin.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nd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51): 30-46.

-
- [9]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04):80-90.
- [10]吕炜.公平增长与公共支出的政策安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05):12-29.
- [11]李秀玫,桂勇,黄荣贵.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公平感——基于CGSS 2010的研究[J].社会科学,2018(07):89-97.
- [12]赵建国,于晓宇.公共服务绩效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社会公平感与居民收入的作用[J].产业组织评论,2020,14(01):98-123.
- [13]廖福崇.公共服务质量与公民获得感——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20(02):115-128.
- [14]黄晓春,周黎安.“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J].社会,2019,39(05):1-38.
- [15]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2(05):95-112,206-207.
- [16]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0,25(05):31-49,243.
- [17]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08):55-67.
- [18]王敬尧,宋哲.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1):27-34.
- [19]王洪川.完善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分析[J].经济学家,2021(01):73-80.
- [20]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2(03):114-128,207.
- [21]李颖晖.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J].社会,2015,35(01):143-160.
- [22]Sik Hung Ng and Allen MW.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J].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5, 33(05):435-453.
- [23]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731-745.
- [24]李娜,袁志刚.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就业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工具变量法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5(22):153-154,160.

注释:

1 数据来源:《中国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11-23.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23/content_5563421.htm。

2 数据来源:《中国住户调查主要数据 2020》。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规定：低于 0.2 表示指数等级极低(高度平均)；0.2-0.29 表示指数等级低(比较平均)；0.3-0.39 表示指数等级中(相对合理)；0.4-0.59 表示指数等级高(差距较大)；0.6 以上表示指数等级极高(差距悬殊)。

4 在对数据进行初步比对分析后显示,保留样本与原始样本在相关社会人口变量的分布上并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从抽样设计和统计分析出发,结果仍可推论目标总体。

5 东部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地区有: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有: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